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職方外紀校釋

〔意〕艾儒略原著

謝方校釋

中華書局

萬

國

全

圖

定價：9.50 元

ISBN 7-101-01438-0/K·634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職方外紀校釋

〔意〕艾儒略 原著

謝 方 校釋

中 華 書 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職方外紀校釋

〔意〕艾儒略 原著

謝 方 校釋

、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37×1092毫米1/32•6¹/₄印張•93千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9.50 元

ISBN 7-101-01438-0/K·634

前 言

從十六世紀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中葉，西方耶穌會派遣了一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的宗旨雖然是在傳播基督教義，宣揚天主精神，但同時卻把西方文化帶進中國，也把中國文化傳到了西方，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很多工作。其中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一書，就是傳教士用西方宗教地理學觀點寫成的中文版的第一部世界地理，也是傳教士衆多譯著中較有名氣的一種。這部書在中國的流傳，反映了中西兩種不同文化相遇後產生的矛盾、碰撞和融合的情況，是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籍。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將它加以點校和注釋，並列入《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出版。

艾儒略原名 Giulios Aleni，意大利人，生於1582年，1609年受耶穌會派遣至遠東。1610年抵澳門，1613年即明萬曆四十一年抵北京，後歷經上海、揚州、陝西、山西等地，進行傳教活動。泰昌元年(1620年)抵杭州。時值教案事起，護教最力者李之藻及楊廷筠均為杭州人，故當時教士多至杭州，匿於李、楊家中。天啟三年(1623年)夏，艾儒略在楊廷筠的協作下，完成了《職方外紀》一書，是年秋付梓。天啟四年(1624年)，葉向高由北京告老回歸故里福州，道經杭州，延艾儒略入閩。天啟五年(1625年)艾儒略至福州，在福建開教。明亡後，艾儒略避亂至延平山中，清順治六年(1649年)卒於延平。艾氏在

福建二十四年，除宣教工作外，還廣泛與閩中文士交往，有“西來孔子”之稱。僅《熙朝崇正集》（抄本）就收入閩中文士題贈艾氏詩共七十一人（據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艾儒略傳》）。艾儒略的著述主要有：《大西利先生行迹》、《天主降生言行紀略》、《萬物真原》、《性學樞述》、《三山論學記》、《西學凡》、《西方答問》、《職方外紀》等。其中後三種是艾氏介紹西方學術的著述，《西學凡》是介紹歐洲教育及大學所設的課程綱要；《西方答問》是介紹歐洲文化及各種制度的情形，都可與本書相互參看。

自十五世紀末人類進入地理大發現時代以後，歐洲的世界地理學也起了急遽的變化。不但地圓說、五大洲說、海洋相通說已為人們所實證，而且美洲新大陸、非洲大陸和亞洲遠東地區也紛紛被歐洲人所認識，成為地理學的最新內容，人類從此進入了面向全世界的新時代。但是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卻仍然牢固地守着天圓地方、中國在世界中央的舊觀念，閉關自守，固步自封。十五世紀上半葉雖然出現過鄭和的偉大海上航行，但鄭和以後，不但沒有繼續前進，反而步步後退。到十六世紀，中國的帆船便全部退出了印度洋，而這時西方卻在大踏步走向世界。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西方耶穌會士利瑪竇進入中國，在肇慶首次展出了他帶來的世界地圖，接着又親自繪製了中文的世界地圖，使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基本面貌，這是對中國傳統的地理觀念首次衝擊。天啟三年（1623年）艾儒略寫成《職方外紀》，這是更為有力的第二次衝擊。一部分知識份子開始接受了西方的世界地理觀念，對後來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特別是世界地理觀念的形成，起了深遠的影

響。關於這一點，我在《〈職方外紀〉和中國新舊世界地理觀念的變化》一文（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5期）中已有論述，這裏就不談了。

《職方外紀》明刊本原署名是“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楊廷筠彙記”，為什麼稱“增譯”和“彙記”呢？

原來艾儒略寫《職方外紀》是另有所本的。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這底本是利瑪竇的《萬國圖志》，但這不是事實。李之藻在《刻職方外紀序》中曾說得很清楚：

“會閩稅璫又馳獻地圖二幅，皆歐邏巴文字，得之海舶者。而是時利己即世，龐、熊二友留京，奉旨繙譯。……別又製屏八扇，載所聞見，附及土風物產，楷書貼說甚細。……而龐、熊旋卒於途，其底本則京紳有傳寫者，然皆碎玉遺璣，未成條貫。今年夏，余友楊仲堅氏與西士艾子為增輯焉。”

所謂“底本”就是指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所寫的抄本。龐氏是西班牙人，閩稅璫所獻的世界地圖可能得自西班牙海舶，故《職方外紀》中的地名譯法與利瑪竇的《萬國全圖》中的地名很不一樣；《職方外紀》所載西班牙及美洲的材料也特別豐富，主要就是因為它是根據龐熊二人的“底本”增補寫成的。

至於艾氏增補資料的來源，據他在《自序》中所述說：

“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增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茲賴後先同志，出遊寰宇，合聞合見，以成此書。”

因此，艾氏增輯材料的來源為：一、他自西方帶來手輯的“方域

梗概”，大概是西方流行的世界地理輯要；一爲耶穌會士在世界各地的親歷見聞。艾氏所說的“後先同志”，除了龐迪我、熊三拔的“載所聞見”外，可考的還有鄧玉函（Joannes Terrenz，即本書卷一印弟亞條之鄧儒望）、鄂本篤（Bento Goes，參見本書卷一回回條注釋）二人。鄧、鄂二氏所提供的，都是西方對印度和中亞地區地理的最新知識。所以《職方外紀》不但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部陌生的世界地理，而且對西方來說也是一部有着十七世紀最新材料的世界地理。

由此可見，所謂“艾儒略增譯”，其實就是“艾儒略增補”，之所以稱爲“譯”，是因爲增補的材料原來都是歐洲文字，由艾儒略譯成中文，正像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原署名是“玄奘奉詔譯”一樣。至於楊廷筠的“彙記”，就是文字上的加工整理，即艾自序中說“訂其蕪拙”，使它適合中國讀者的習慣。原書二人同時署名，說明楊廷筠文字整理之功不可沒，亦應是作者之一。但更正確地說來，《職方外紀》的作者應包括四人，即：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楊廷筠。可是從《四庫全書》開始，《職方外紀》僅署名“艾儒略撰”，成爲一人，以後就習慣將此書稱爲艾氏一人撰寫了。

《職方外紀》一書爲十七世紀的中國讀者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知的外部世界的情況，然而其後二百年間，除了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中國教士樊守義曾陪同歐洲修士艾遜爵遊歷過歐洲意大利外，竟沒有一個中國人走出國門，根據《職方外紀》所提供的“海道”和世界各地情況，作一世界性的航行和遊歷。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方始出現了廣東人謝清高乘搭外國商船，遊歷亞、歐、非、美洲各地，這是第一位出遊世界的

中國人（見所著《海錄》，馮承鈞注，1955年中華書局）。但是清高的周遊世界，並不是受到傳教士世界地理的影響和啟迪，而僅僅是爲了謀生才出洋的。他從未見過《職方外紀》一書，因此《海錄》中所載世界各地的地名，與傳教士所譯的地名大相逕庭。爲什麼《職方外紀》問世以後，長期以來中國竟沒有人到世界各地去親歷一番，證實一下它是否真實呢？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職方外紀》本身看，主要是由於它存在着兩個根本性的缺點，就是它的宗教神學觀點和歐洲中心觀點，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格格不入。因此中國人對它不感興趣，不予相信，這卻是事實。

艾儒略在自序中一開始便說世上萬物是“造物主”恩賜給我們的，甚至人類也是“造物主”使產生的。這“造物主”就是“天主”、“上帝”。書中把人類的文明進步都歸結爲信奉天主；野蠻、落後都歸結爲不信天主，不奉上帝，而一旦信奉天主以後，則變成文明進步了。書中把許多《聖經》中的神話故事也作爲人類的歷史來敘述，認爲如德亞（猶太）是“天主開闢以後，肇生人類之邦，……至今將六千年”。這都是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書中還對歐洲文明極盡其謳歌之能事，而對中國、印度、埃及和阿拉伯國家的偉大古代文明及其影響則避而不談或有意貶低，特別是對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國家採取否定和敵視態度，這都是完全不對的。因此，傳教士們的世界地理問世後一直受到許多人的抨擊。魏潛著《利說荒唐惑世》中說它是“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毋論其它”。（載徐昌治輯《聖朝破邪集》卷三）《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評《職方外紀》說：“又其所

自述彼國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華所及者，雖荒遠狃獠水土奇異，人性質橫，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稱五洲之說，語涉誕誑，則諸如此類，亦疑爲勦說贅言，故其說之太過者，不俱刊而不紀之。”《四庫提要》也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中國人長期對《職方外紀》抱不信任態度，這是與書中的宗教神學觀點和歐洲中心觀點分不開的。直至今日，我們在肯定這本書的歷史意義的同時，對書中這兩個根本性的缺點，仍是應該否定的。

最後談談本書的版本。據李之藻《刻職方外紀序》，《職方外紀》成書於天啟三年（1623年）夏，刻印於是年秋。但初刻本現在已經很難看到。現在見到的明刻本只有《天學初函》本和閩刻本。《天學初函》明末翻刻本很多，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北京圖書館藏的《職方外紀》五卷本，即爲《天學初函》本，爲李之藻於崇禎二年（1629）前編刻。閩刻本的單刻本爲六卷本，原藏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書庫，現藏北海書庫，首頁有“閩南黃燠肖岩圖籍”圖章一枚。王重民先生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見到的《職方外紀》也是閩刻六卷本，與此相同（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閩刻本除原書各序外，增加了葉向高的序冠於各序之首。葉序中說：“此書刻於淞中，閩中人多有索者，故艾君重梓之。”故此閩刻本爲天啟五年，（1625年）艾氏入閩後至天啟七年（1627年）葉氏逝世前翻刻的，它的祖本就是艾氏從浙江帶去的原刻本，因此，此閩刻本在時間上要比崇禎二年前李之藻刻的《天學初函》本要早。

但閩刻本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即刻書時福建士人王一鈞妄將原書五卷改爲六卷。改的辦法是將原書卷四最後一節

《墨瓦蠟尼加總說》提出來，再加上一篇王一錡自己寫的《書墨瓦蠟尼加後》，作為附錄，成為卷五，而將原來的卷五變成卷六，這樣就成為六卷本。王重民先生說六卷本是“增補翻刻本”，欠當，因為它實際上並沒有增補新的內容，祇不過是將原書卷四一部分變成卷五，附上王一錡寫的一篇完全是畫蛇添足的“書後”作附錄罷了。（改為六卷之不當，參閱本書卷四《書墨瓦蠟瓦加後》注釋。）

閩刻本雖然有妄改為六卷的嚴重毛病，但它仍是一個很重要的本子，因為它除了將五卷改成六卷這一缺點外，它是最接近原刻本的一個本子。這裏可舉一例：在《天學初函》本五卷本中，卷一如德亞條下，有一雙行夾注云：“古名拂菻，又名大秦，唐貞觀中曾以經像來賓，有景教流行碑刻可考。”這條雙行夾注顯然不應為原刻本所有，而是後來李之藻刻《天學初函》時加上去的。因為景教碑最早於天啟三年（一說五年）在陝西西安郊外由農民發現的。據耶穌會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寫的《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序》中說：

“是碑也，大明天啟三年關中官命啟土，於敗牆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廓外金城寺中。岐陽張公廣虞搨得一紙，讀完踴躍，即遣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土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

景教碑全文首次發表於《天學初函·天學凡》一書的附錄中，碑後並有李之藻寫的《書景教碑後》一文，時間是天啟五年

(1625年)六月。據上引陽瑪諾文，從天啟三年碑出土到置於金城寺、後由張賡虞發現揭碑文，又將所揭碑文送到杭州李之藻處，經李之藻研讀，無論如何神速，都很難於當年(天啟三年)夏天，便由艾儒略或楊廷筠在《職方外紀》中首先作出報導。而且李之藻寫《書景教碑後》是在天啟五年六月。很可能是天啟三年此碑在西安出土，天啟五年李之藻才首先獲讀此碑。所以現在很多學者都以爲景教碑是天啟五年出土的(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冊頁119，中華書局1977年；阿·克·穆爾[A.C. Maule]《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郝鎮華譯，頁34，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就是指這一年景教碑才由李之藻釋讀公布於世。陳援庵先生在《浙西李之藻傳》一文中(收入《陳垣學術論集》第一集，中華書局1980年)也指出《職方外紀》成書於前，《景教碑》發現於後。因此，天啟三年夏成書的《職方外紀》是不可能出現關於景教碑的夾注的。《天學初函》本中有關景教碑的夾注是天啟五年後李之藻加上去的，或由楊廷筠補上去的。此外，我們還看到，閩刻本和《墨海金壺》本《職方外紀》中就沒有這一段關於景教碑的夾注，這並不是閩刻時和《墨海》本張海鵬校刻時有意刪去，而是閩刻本和《墨海》本是根據艾儒略的1923年原刻本翻刻的，不是根據《天學初函》本翻刻的，原刻本根本就沒有這段夾注。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閩刻本不但要比《天學初函》本要早，而且它也是根據原刻本翻刻的本子。除了它妄將五卷改爲六卷外，它是最接近原本的本子。難怪繆荃孫先生誤認它是天啟三年的原刻本了(見《藝風堂藏書記》卷三)。

北京大學圖書館還有明版《職方外紀》五卷本的單刻本和

日本抄本六卷本各一種。單刻本內容和序的順序、字體、板式與杭州本《天學初函》本完全相同，如德亞條下也有小字夾注。此本可能是從《天學初函》中抽印出來的。日本抄本無抄寫人名字，有日文假名注音，爲六卷本，葉向高序冠於首，次爲李序、楊序、瞿小言、許小言、艾自序，然後有龐迪我、熊三拔的奏疏二本。此奏疏爲其他各本所無，應爲原刻本所有；卷一如德亞條下亦無小字夾注。抄本最後是熊士旂的跋，迄今所見各本都將熊士旂的跋置於正文之前，由此都可看出此日抄本所據可能即爲最早的閩刻六卷本（天啟七年葉氏去世之前的刻本），比柏林寺原藏的閩刻本要早。但日本抄本錯字很多，也不完整，卷五至王一錡的《書墨瓦蠟尼加後》中的“其人物、土產、政治、風習”一句爲止，以下及卷六便闕如了。

《天學初函》在明末翻刻的也不少。陳援庵先生在《重刊靈言蠡勺序》中曾說：“《天學初函》在明季流傳極廣，翻板者數本。”（《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我沒有對《天學初函》的版本進行過調查，但據《中國叢書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統計，只有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浙江圖書館三家入藏。而北大本和北圖本的《天學初函》中的《職方外紀》完全相同，均可視爲崇禎二年李之藻死前一年所刻。以上所談的是明版的《職方外紀》。

清代的《職方外紀》則收入於幾種叢書之中。它首先收入乾隆時《四庫全書》之中（文淵閣本，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爲五卷本，據《天學初函》本抄錄。嘉慶時張海鵬又將《職方外紀》收入《墨海金壺》中，也是五卷本，其中卷一如德亞條下的雙行夾注沒有，可知它不是據《天學初函》翻刻的，而是據較早刻

本翻刻的。道光時錢熙祚的《守山閣叢書》亦收入《職方外紀》，五卷本，如德亞條下有雙行夾注。此外光緒浦氏輯的《皇朝藩屬輿地叢書》亦收入《職方外紀》，也是五卷本。我還未見到清版的六卷本《職方外紀》，大約六卷本明末僅流行於福建，到清代就不再翻刻了。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中的《職方外紀》，也是據《守山閣》本影印的。

現本書以北京圖書館藏明刻《天學初函》本五卷本為底本，校以原柏林寺書庫藏的明刻六卷本（簡稱閩本）。《四庫》本（文淵閣）、《墨海金壺》本（簡稱《墨海》本）、《守山閣叢書》本（簡稱《守山》本）、《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簡稱《藩屬》本）及日本抄本亦用以參校。正文前的序、跋、小言，各本也不一致，現悉數收入，依時間順序排在全書之前，《奏疏》則據日本抄本補入。書中地圖，《萬國全圖》及各洲圖各本均有（《天學初函》本原將各洲圖分置於每卷各洲之前，現全部置於《職方外紀首》之前）。閩刻本及《守山》本還有《北輿地圖》及《南輿地圖》，似為原刻本所有，他本均漏刻，現據《守山》本補入（因閩刻本圖不清楚）。書中凡有底本改動之處，均出校勘文字說明；底本不誤而諸本有誤者，一般不作說明。底本有明顯的誤刻，如“毫末”作“毫末”（瞿式穀小言末段）、“土魯番”作“上魯番”（卷一回回條）等，均逕改正不出校。

注釋主要是對地名、人名、動植物名和一些專有名詞的解釋，儘量說明原文及出處、參考材料等。在注釋過程中，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龔方震先生和歷史研究所吳德鐸先生都曾給予熱忱的幫助，在此一併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為了使索引檢查方便，書中各條題目均加阿拉伯數字，各段均加

英文字母，表示順序。書中還有一些未考的地名、人名和動植物名，一時尚未查到出處；有考的也難免有欠當和錯誤的地方，都熱切地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謝 方 1990 年 8 月

於北京西郊翠微路寓所

又記：本書初稿完成後，又從陸峻嶺先生處獲知日本榎一雄撰有《職方外紀之中央亞細亞地理》（載《和田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1960 年）和《關於職方外紀之刊本》（載《岩井博士古稀紀念・典籍論集》，1963 年），並蒙他借閱二文的覆印件。榎氏“中亞”一文，指出《職方外紀》中回回條之中亞地名大多參照鄂本篤行紀，與我的意見不謀而合（參見本書卷一回回條有關地名注釋）。榎氏版本一文，據日本《內閣文庫》及《東洋文庫》所藏明刻《天學初函》本，指出《職方外紀》有杭州刊本的五卷本和福州刊本的六卷本二系統，所論亦基本與我相合。惟榎氏並指出《內閣文庫》藏本中序言之後尚有龐迪我、熊三拔的奏疏二本；在《萬國全圖》之後，尚有《北輿地圖》和《南輿地圖》二幅，然後才是《職方外紀首》。現國內僅見北大圖書館藏的日本抄本有奏疏，為閩刻系統最早的本子。北京圖書館藏的閩刻本無奏疏，有南北輿地圖二幅。可能是在翻刻時將奏疏刪去了。關於中國所見《職方外紀》的版本及日本所見版本的異同，尚有待將來作進一步研究比較。

1990 年 10 月又識

目 錄

前言	1
職方外紀自序(艾儒略)	1
職方外紀序(楊廷筠)	4
刻職方外紀序(李之藻)	6
職方外紀小言(瞿式穀)	9
職方外紀小言(許胥臣)	11
職方外紀序(葉向高)	13
跋(熊士旂)	15
奏疏(龐迪我 熊三拔)	17
萬國全圖	20
北輿地圖	21
南輿地圖	22
亞細亞圖	23
歐邏巴圖	24
利未亞圖	25
南北亞墨利加圖	26
職方外紀首	27

職方外紀卷之一32

亞細亞總說..... 32

韃而韃..... 34

回回..... 37

印弟亞..... 39

莫卧爾..... 44

百爾西亞..... 45

度爾格..... 48

如德亞..... 52

則意蘭..... 58

蘇門答刺..... 59

爪哇..... 61

渤泥..... 62

呂宋..... 62

馬路古..... 63

地中海諸島..... 64

職方外紀卷之二67

歐邏巴總說..... 67

以西把尼亞..... 75

拂郎察..... 82

意大利亞..... 83

亞勒瑪尼亞..... 92

法蘭德斯..... 94

波羅尼亞..... 95

翁加里亞..... 96

大泥亞諸國..... 96

厄勒祭亞..... 98

莫斯科未亞.....100

地中海諸島.....102